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三期 ——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0c)

【史海钩沉】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往事追忆】	围困“苏修”大使馆	戴维堤
【难忘岁月】	三天流血事件	梁守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 辛子陵 •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1）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2）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 第一次打击：批投降主义

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

1973年2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做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词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东听了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周恩来拒绝对美做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年6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3）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4）

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内容。周恩来赶紧写信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还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了将要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而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又不得不指定由周恩来作。这样一来，中共高层人物心中就都有数了，尽管周恩来作十大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名单时，毛泽东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5）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6）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这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7）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得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谈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的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美国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连日开会为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8）

在18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冷酷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垮；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地完成了中国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作了八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9）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句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后，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自此形成了“四人帮”。

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搂出1972年2月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

此事的原委是：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地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时，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地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10〕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私下谈话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词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采球又扔给了毛。这就是江青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的经过。

跟着起哄的有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总理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于是，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为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11）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就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在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12）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毛要邓出

来说这个话，既是要提醒周，又是要邓在取代周的地位后自律。

毛泽东是逐渐透露要江青接班的意图的。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十个字被删去了。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看过原件，他把删掉的十个字公布了。（13）老夫人和红娘的典故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笔者看过当时的记录稿，这个话正式发表时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独揽的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家天下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江青有野心”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周恩来要求见毛谈一次话，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在会上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兼职秘书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闻生提出，自己年龄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月4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不能听周恩来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14）

◇ 第二次打击：批林批孔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

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蝟如螭，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让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哪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谈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第20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注：江青致20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个记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部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

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昏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背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12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亡，并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二百八十余人。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他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夠，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是念的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5）

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

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注：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辔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残疾，周习惯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 第三次打击：批经验主义

批林批孔运动夹带着批“走后门”伤人甚众，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不得不虎头蛇尾草草收场。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毛泽东对周的政治迫害丝毫没有放松，经他亲自审查批准，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毛泽东绝不允许周恩来在宁静的环境中养病，要让他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加速精神崩溃和身体崩溃的过程。据陈锡联揭发，江青“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建议政治局开会展开思想交锋。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

邓小平冷眼观察，周恩来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毛泽东绝不会允许江青把刚做过手术的周恩来揪回政治局批斗，毛只是放放空炮，对周保持政治上的压力，他不站到第一线来，就是要留有余地。毛刚说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马上就批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显然不符合毛的意图。他审情度势，于4月18日利用陪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进言了。邓直率地说：“我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立即转圜，说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看出来”，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于4月23日在姚文元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16）

这就变成泛泛地反倾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了。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6月1日，周恩来才住进305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扩散转移的信号，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 第四次打击：评《水浒》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1975年7月6日、20日，周恩来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作试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日为毛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旁。这些表现竟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这就是评《水浒》。8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在毛不能阅读的情况下，他让从北京大学请来女教授芦荻给他读《水浒》。听《水浒》期间，8月14日他发表即兴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17）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雕。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9月7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他不避嫌疑，把邓小平继任总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理。毛泽东后来为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1974年6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帐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把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18）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经验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没想到周恩来这一次反映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众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君王，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面对这位功在党国、名满天下的总理，毛泽东的明枪暗箭使自己失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对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险计划将要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

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的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多多。1976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注释：

1. 林青山：《四人帮组阁梦的破灭》，《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9月第3期。
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页脚注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下辑
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55页脚注76：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1981年8月26日。
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脚注4：姚文元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有关情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1页。
7.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页脚注92：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1981年11月11日。
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页脚注98：访问乔冠华、章含之谈话记录，1981年11月11日。
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中文版第529页。
11.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5页。
1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页脚注104：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8年春。
1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
1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脚注113：章含之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1970年7月21日。
15.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16.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17.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1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脚注59：陈锡联谈“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1980年8月16日。

~~~~~

## 【往事追忆】

### 围困“苏修”大使馆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7年1月25日晚，北航红旗办公室接到了派驻《人民日报》的红旗战士吴某某的电话，说刚收到我驻苏使馆急电，我一批即将回国的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被苏联警察打伤，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消息刚刚通知外交部和中央。

韩爱晶一听，立即召集主要头头们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苏修”对我们的严重挑衅，

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中国人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迎头痛击“苏修”的挑衅，捍卫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暴行，并发电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对我受伤的留学生表示慰问和声援。

1月26日早上天还未亮，北航红旗广播站奉命以最大音量向全院广播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要求红旗战士们立即起床参加游行示威，并欢迎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

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形式的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这次是抗议“苏修”暴行的爱国行动，更没人反对。于是，全院师生数千人很快集合好了队伍。头头们决定由我带队，于是，我带领北航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直奔东直门内的苏联大使馆。这时天刚刚放亮，其它大专院校和单位也陆续从北航得到了消息，立即响应。很快，一支支游行队伍跟在北航的队伍后面，向城里进军。

一路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群情激奋，斗志高昂，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口号声震天响。红旗战士们唱起了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道路多么宽广。共产党指引我们的航程，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向着胜利的方向。

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是李劫夫的代表作，写于1965年，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风靡一时。每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同学们必唱这首歌。这首革命歌曲无论政治内容和艺术水平皆无懈可击：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欢畅，进行曲风格，时代感极强，唱起来立即给人一种奋勇向前，无往而不胜的豪迈之情。文革中李劫夫为毛主席的许多诗词和语录谱写了曲子，有些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语录歌也风靡一时，全国人民天天唱，尽管有一点不伦不类。实事求是地说，象《蝶恋花——答李淑一》和《沁园春——雪》等歌曲还是不错的，很有水平，后来无人能超过他。

李劫夫文革初被打成“黑帮”，北航红旗派人把他“抢”来保护了起来，他对北航红旗革命小将十分感谢和赞赏。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为北航红旗战士写的《红旗战歌》谱了曲。

（笔者注：关于李劫夫，关心的人很多，本书略作交代。李劫夫离开北航后即被“解放”，但可惜的是，由于1943年在晋察冀时和黄永胜有点部属关系，糊涂的李劫夫后来上了林彪集团的“贼船”，并曾为林彪上台写过半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未写完）。1971年10月20日，李劫夫被隔离审查。5年后的1976年10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1979年11月20日，辽宁省委“纪委”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被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李劫夫的所有歌曲作品被封杀、停唱10年。直到1981年在有关人士的质疑和呼吁下，李的作品才被解禁。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数万群众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陆上”。1999年国庆阅兵式，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陆上”响彻云霄。）

书归正传。我红旗战士们高举红旗，一遍一遍地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和“红旗战歌”，一遍一遍地高呼着“打倒苏修！”、“讨还血债！”的口号，昂首阔步地向苏联大使馆进军。

半路上，早八点时，各单位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广播中报导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广播中还说苏修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大愤慨。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已人山人海，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向苏联大使馆挺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我带领的北航游行队伍最先到达了苏联大使馆门口，立即把使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使馆大门向南通东直门内大街的路文革初已改名为“反修路”。顷刻间，“反修路”和东内大街上，游行示威的队伍已人山人海。“打倒苏修！”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北京上空。

苏联大使馆大铁栅门紧闭，门内有几个苏方人员向外探头探脑地张望。我武警战士和警察已把使馆保护了起来。我和同学们举着拳头，对着使馆大门不停地高呼：“打倒苏修！”“向苏修讨还血债！”“坚决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要把苏联大使馆震塌。

这时有学生请示我，可否冲进去抓出几个“苏修”分子批斗一下？

我尽管也处于极度愤怒和昂扬之下，但我是头头，不能胡来。我向大家宣布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搞过火行动。因为我国在苏联也有大使馆，我们若砸了苏联大使馆或打了他的人，对方一定要搞报复，所以不能蛮干。这点常识和水平我们还是有的。

这时，一位卫戍区的首长也找到我，要我们注意不要抓人、打人。他转达卫戍区领导同志的话说，只要学生们不冲进使馆，干什么都行。若万一“苏修”把我们的学生扣住，那就把人抢出来，“苏修”抗议就抗议，由外交部处理后事。

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有一辆“苏修”大使馆的伏尔加车从外面开来，现被堵在反修路口。愤怒的学生们已向车上倒了许多墨汁、浆糊，贴满了标语。车里的人吓坏了，不敢出来。学生们请示我可否把送上门来的“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把车掀翻，点火烧了算了。

当时我也正在激奋状态下，我也是才20来岁的热血青年。我当时认为，把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一下，把车烧了也算不了什么，谁让苏修打了我们的人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是合情合理的。红卫兵嘛！出点格没关系。我几乎就要同意采取行动。凭我的身份，只要我一点头，学生们什么也敢干。但是，理智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我必须冷静，不能蛮干，这是国家大事，不能让中央为难。

谢天谢地，我又避免了一次错误和灾难。当时若头脑发热，同意学生们蛮干，烧毁辆汽车倒没什么，后来也不会让我们赔，但车内的“苏修”分子很可能被愤怒失控的学生们打死。那将把事情闹大，造成严重的国际事件，甚至会导致中苏战争爆发，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的珍宝岛事件就是如此。

于是，我分开众人，赶到了伏尔加车前面。透过车窗，见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开车，是个胖子。我举着拳头挥舞着，对着车内的人用俄语大喊：“混蛋！法西斯！打倒苏修！”我是学俄语的，会几句苏联话。

然后，我要大家让出一条路出来，用手势引导着伏尔加车向前开。这时有人大喊：“别让苏修轧死你！”我笑着说：“他敢！”这时，我看到车内的胖子向我作了一个揖，慢慢地发动了车，

跟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蠕动，在两边学生们的口号声中，一直开到了使馆门口。使馆的大门开了，我让开道，伏尔加车鸣着喇叭开了进去，大门又立即关上了。

我的行为受到了警察们和武警首长的赞扬。

随后，我们在大使馆门口宣读了抗议书。学生们又喊了一阵口号。然后，我便带领游行队伍一边游行一边往学校返回。

这次围困苏联大使馆，抗议“苏修”暴行的革命行动，十分顺利和成功，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和意外事件，事后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表扬。后来得知，“苏修”也搞了对等行动，派人到我驻苏使馆门口闹了一顿，但也未敢有出格行动。当时我们若行动过火的话，“苏修”一定会报复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次涉外事件后来都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和“5.16”罪行。最典型的事件是“火烧英代办”事件。当时，英国佬在香港反华，迫害我同胞。英国军警悍然开枪打死我同胞15人，并把我新华社记者判刑。愤怒的中国红卫兵和学生们忍无可忍，冲进了朝阳门外的英国代办处公寓，有人放了一把火，把英代办公寓楼烧了，但没有烧死人。这就是轰动全世界的“火烧英代办”事件。后来抓“5.16”运动中，许多人为此被整，被关，罪名是破坏中国外交政策的所谓“5.16”罪行，并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黑后台。历史证明，这是胡说八道。对此，周恩来总理后来说，此事与王力无关，是外交部的最后通牒引起的。

我带人围困苏联大使馆一事，由于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错误行为，后来一直没人说三道四，整我时也没提过此事，这就对了。否则，我将以卖国罪起诉他们。

事过多年之后的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好汉”们用三颗导弹准确地炸毁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许杏虎、朱颖、邵云环等三名英雄记者，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北约“好汉”们的这次军事行动，绝对不是“失误”，而是百分之百是故意挑衅，绝对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蔑视。此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气得骂大街。可怜我们的导弹技术还不太过硬，没法把美国白宫炸几个窟窿，这口恶气实在难出。当时，官方组织的一些中国学生们倒是在警察们的保护下去美国大使馆门口转了转，喊了几句口号就完事了，就象当年我们在苏联使馆门口一样，没有任何过激行动，这就对了。美国太强大了，还是忍气吞声为好。国家大事不是闹着玩儿的，应当有理、有利、有节，谨慎小心，三思而行，小不忍则乱大谋。等我们的国家慢慢地建设好了，经济、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和反导弹技术远远地超过了美国时，也发三颗导弹把美国加洲的大沙漠炸几个窟窿，出出气就行了。

想不到两年之后，一个叫本·拉登的家伙替中国人出了这口气。但某些中国人不买账，尊称他为“恐怖分子”。

□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

~~~~~

【难忘岁月】

三天流血事件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五章 惊涛裂岸

如果说“八·二七”事件前后是乱流击水的话，到了十一月中旬，不同思潮经过不断地分化组合，汇成两股巨大的洪流。造反派充分运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思想武器，以批判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目标，借助强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保守派充分利用地方党的权力资源，以保卫省委，压制群众造反为目标。它缺少毛泽东思想的支持，却由大变小，由强变弱。这两股洪流渐渐势均力敌，他们像是从两座高山直泻的山洪相对而下，在一条狭窄的山谷中相撞击，爆发出巨大的冲量。这种冲量有力地震撼着省委的统治堤坝。

一、震惊中央的“三天流血”事件

在“三天流血”事件发生前，北京召开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召开的具体日程、日期我们当时都不清楚。只知道安徽省的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参加了这次会议，还知道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毛泽东主席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通思想，转变立场，看清方向。用一个形象的词来概括，就叫“磨屁股会”，就是将自己的屁股坐在革命造反的“左派”一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具体的解释：“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希望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诚恳地向受压制的左派群众检讨错误，争取得到群众的谅解，从而带领群众批判刘、邓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李葆华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从北京回到合肥。但“八·二七”等造反组织迟迟听不到省委声音，不知道省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听说，省委领导躲到含山县偏僻的清溪镇召开“磨屁股会”去了，会议期间，不知道谁说“八·二七”来了，他们居然休会疏散。

“八·二七”根据传出来的中央会议精神，就坚决要求省委向全省人民公开作检讨，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直到十一月五日左右负责与“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联系的陈庆泉到司令部找到我，说：下午三点张凯帆同志在稻香楼东四楼一楼某某房间和我见面，具体商讨省委检查问题。我和胡玉才、吴祚云按时赶到，陈庆泉也赶到了。大概快到四点钟，张凯帆才到。我们质问张为什么迟到？开始就不讲信用。我们开始给他施压说：“今天不谈了，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谈也白谈”。说完站起来要离开，陈庆泉赶紧拉住我，又是道歉，又是赔不是。这样我们再坐下来。我开头就向张凯帆提一个问题：“今天你是代表省委，还是代表你个人？”他答：“当然代表省委。”“省委信任你吗？”我挑逗性地问了他一句，我当时带有一定策反的语气引他。因为我一直认为省委内部不应该铁板一块，应该有不同意见。加上我同胡玉才都很敬重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敢于直言。所以一直想把他从省委里拉出来，能站出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我们和张凯帆的谈判并没有什么火药味。后来张回答说：“省委派我来，当然信任我”。我又问了一句话：“你同我们商定的问题能算数吗？”张说：“没有把握的问题我会向省委汇报”。这时我们提出李葆华在检查中必须承认：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的“八·二七”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镇压“八·二七”革命造反队是反革命行为；解散省委策划的保守组织等内容。在会议规模和形式上，我们提出：应在省体育场召开二十万人大会公开检查，同时要向全省直播；会议由“八·二七”主持；安全由省委负责等。张说：“你们提的这些条件，有的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们，比方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省委必须要承认。至于反革命事件这类的东西，你们也考虑换提法，如果你们一定坚持，我要向省委常委汇报。在体育场召开二十万人大会，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们做不到；不是怕开二十万人大会，而是省体育场容纳不下，大家不能站着开会，坐下来最多容纳十万人。这个我们早测算过，加上体育场两边的进出走道，最多再加二万人，共十二万人；至于会由谁来主持，我看我们再商量。”我们坚持原来的要求不让步，要求他如实向省委汇报。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某些条件省委是

不会答应，也是不能答应的。准备再谈时修改我们原来的意见。

大概又过了两天，陈庆泉又来通知我们：老时间，老地点，张凯帆再和我们商量省委检查的问题。这次大家都如期赴会，我们这边少了胡玉才，换了段玉昌。

见面后，我开始就问：“你说过的话有多少能兑现？”张说：“所以今天请你们来再商量。”不过我临时又加了一个要求：“李葆华的检查要先经‘八·二七’审查”。张说：“这有困难，省委常委还未定稿，怎么给你们？你们看了不同意，省委怎么办？改来改去，改到什么时候？”我考虑他的话也有道理。张又说：“我答应你们，省委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省委认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就包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再单独提出来。”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是要省委公开检讨；二是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有这两条就够了。证明省委错了，“八·二七”对了，胜负已经清楚，过去的许多事件再翻陈帐意义不大。所以那一天，我们同张凯帆很快达成协议：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五万人大会，李葆华代表省委公开向全省人民检讨文革初期所犯路线错误，会议还是由省委主持。商定后，我又问张凯帆一句：“这次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让步，你说的话应该算数了吧？”张很干脆地讲：“一定算数，一定算数”。

其实，对张凯帆的话，我不认为省委会兑现。

果不出我所料，十一月九日，省委公布了“中共安徽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并由陈庆泉通知我们，省委不开大会作检查，以书面检查代替。虽然这一结果我们已料到，但仍有受骗的气愤。这使我想到了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最讲认真二字”的话语。一级偌大的省委说话不算数，随便失信于民。我在电话里告诉陈庆泉：“省委不要错过这次改过的机会，错过了，你们以后会后悔的，再想得到这样宽松的检查条件就不可能了。你把我的话转告给张凯帆，让省委等着吧！”这顿火发的果然有效。不多会陈庆泉通知我：“张凯帆同志想很快再同你们谈谈。”我说：“还有什么好谈的？说话不算数，谈了也没用”。经过陈庆泉的劝说，我还是同张见了面，最后商定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五万人大会。由李葆华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向安徽全体人民作检讨。我还是又问了一句：“这一回该算数了吧？”张说：“没有问题”。我说：“那我就通知‘八·二七’等学生组织如期赶到会场”。张说：“你通知吧。”结果到了十一日晚，又突然通知十一日上午天气不好，改到下午。到了十一日上午十点多钟又通知我们：“下午的会取消，什么时候开，大会另行通知。”这时，我明确地告诉省委：“这次改不了啦，许多远路学校的学生已经走到半路了，下午不要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开。别的群众组织能不能去，我管不了，但‘八·二七’的学生肯定会到，我们不怕雨淋”。就这样，“八·二七”万余革命师生下午一点左右，都赶到了省体育场。这时天已下了小雨，同学们冒着小雨整齐地坐在地上，等省委开会。到了下午三点，主席上空空一人，同学们愤怒了。开着宣传车到长江路游行。这时雨也大了，到省委北门口停下来，高呼：“李葆华滚出来！”“捉拿李葆华！”等口号。结果仍不见李葆华的踪影。于是游行队伍开往稻香楼。到稻香楼找他。到了稻香楼后，由于地方小，临时疏散一部分师生返校，留下远路的同学。大家整齐地坐在各楼层大厅、走廊、小礼堂里，尽管服务人员将卧室房门全部打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无一人走进房门半步”。大家怕是陷阱，再搞第二个“稻香楼事件”。同学们穿着湿透的衣服，互相偎依着取暖。后来由工大、工学院送来饭。同学们吃完饭依然在原处等候李葆华，连到处走动的人都没有。

就这样，同学们穿着湿衣服，互相偎依着一直等到十二日凌晨五点钟左右，李葆华出现了。我和李文安（工学院“八·二七”的头头），还有几个头头，拥簇着李葆华走上小礼堂的舞台。舞台上本来就有扩音设备，我问：“李葆华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省委说话不算数？”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李葆华说话。李说：“我对不起同学们，我来迟了。我现在来，就是向同学们赔礼道歉，赔罪的。”下面的同学喊：“我们不想听你赔罪，回答我们，你为什么骗我们？”李说：“省委不是有意骗你们，主要是怕人多开大会，情绪难控制，怕在会场出现大的冲突。”

这时会场上情绪趋于平缓，秩序也好多了。我当时看到李葆华的狼狈相，产生了恻隐之心。大约在小礼堂里折腾了半个小时，同学们也是一夜未眠。我和台上几个头头商量一下，让同学们回校休息，我们留下数人与李葆华继续交涉。

同学们走后，台上只有我和几个大学的头头留下来与李葆华交涉，七嘴八舌说了一会。我看没名堂，我提议是不是让李葆华先回去，我们等省委通知再谈。这个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李文安最为激烈。他认为将李葆华放走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再能找到他？他提议：“我带工学院的几个同学留下与李葆华继续谈判，你们先回去”。我说：“现在稻香楼里的学生不全是‘八·二七’的，还有蚌埠商学院、芜湖电校等外地的学生，要注意李葆华的安全。”李文安很有把握地说：“梁司令，你放心，我带安工十几个同学在这里，哪个也不敢碰他一根毫毛”。直到那天，李文安才真正进入我的视线。

造成“三天流血”事件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合师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进驻省委北楼小礼堂。原因是合师院的同学一直受压，因为合肥除“红总”的主要力量在合师院。从资源对比上，他们一直处于劣势，他们在省委书记李任之的同意下，住进省委小礼堂，要求省委罢合师院党委书记李瑞的官。省委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也一直不愿意离开省委。就这样一直僵持很久。我也多次作过他们头头张来信的工作，要他们退出省委去战斗，住在省委反而将自己捆死了。我一直有一种指导思想：后发制人，先礼后兵；不扣人、不静坐、更不愿意绝食，类似合师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样的事，工大“八·二七”从来未发生过。

由于合师院学生常住不走，引起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不理解，省委成了“三天流血”事件的现场。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更为重要的导火线，那就是陶铸来电。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十一月十三日前后。由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省委书记任质斌没有把李葆华在稻香楼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华东局的魏文伯。说：“李葆华‘神志不清’‘血压升高’，再搞下去就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陶铸打来电话。我从传单上知道陶铸电话内容大致是：李葆华同志从现在情况看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批判；李葆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答应的问题不算数；扣留李葆华同志是错误的，应立即放掉他，让他回省委工作。我看到陶铸指示的传单后，也不清楚李葆华在稻香楼的情况如何。我亲自到稻香楼去看情况。先见到了李文安，他带两个同学站在楼道里，我问他：“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保护李葆华。”我问他李葆华的情况怎样？李文安说：“李葆华很好，吃得饱，睡得香，比他在省委好。我们站岗，谁敢碰他”。我说他现在在哪里？李说：“他在会议室接待蚌埠商学院的代表，正在谈问题。你要不要看看？”他带我看了李葆华。李葆华正在低头记东西。我们没有打招呼，但我看到李葆华状况确实很好，放心了。这时，我才同李文安说陶铸来电的问题。李说：“我知道，他们造谣”。我说：“能不能尽快将李葆华放掉，否则矛盾会激化。”李说：“矛盾激化了才好，解决问题就快了。现在不是我们说了算，外地串联队扣住不放”。我说：“那不行，做工作一定要放人”。李文安答应。

十一月十五日的中午，陈庆泉又到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谈放李葆华的问题。我说：“我到稻香楼去过了，李葆华的情况不象造谣传单说的那样，他很好。李文安答应做外地串联队工作，很快就放”。就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又写了张条子，要求李文安今天下午一定要放人，如果外地串联同学不同意，我们要采取措施。语气比较严厉。结果送信人到了稻香楼进不去，安纺上千名工人将稻香楼入口处封锁了，只好回来向我报告。三天流血事件从此开始了。

由于十五日下午我不在稻香楼现场，我引证安徽革命大学政治系串联队教工目击者的话：

“十五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李葆华出现在东头三楼的阳台上，用双手指着胸脯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这里身体很好，很安全，请大家放心。我们省委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大家有权力批评；你们大家也有权力批评。我没有站在桌子上，我在台子前讲话，桌子上还有开水。同志们回去，我很快就回省委去。’”这时，拥在楼前的一些稻香楼服务员，对着李葆华反复大喊：“下来！下来！”多次打断他的讲话。看到他精神很好，讲话从容不迫。和他站在一起的有四个同志，他在讲话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插嘴。李葆华讲过之后，就进去了。”“五点钟左右，看到有一辆绿色高蓬吉普车，车内还放着一件长大衣。车到东边大厅时停下来，守门人（三十多岁，穿着黄军装）和司机咬了咬耳朵，车子就进去了，停在距边门不远的岔道口上。又过了大约十分分钟左右，东边门外传来轰轰的人声和口号声，由远而近，他们是纺织厂的工人队伍。接着“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人也来了。这时，李葆华再次出现在东头的阳台上。楼下的同学和工人造反组织人不多，有一位同学搬来一个椅子让李葆华坐下。李葆华对楼下群众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身体很好，没有昏倒，没有武斗”。这时楼下人高喊：下来！下来！接着，李葆华指着自己的喉咙，拍着身边一个四、五十岁的高个子干部（据说是省总工会主席陈庆泉）的肩。高个子干部抬高嗓门喊：葆华同志委托我代表他讲话，他叫大家回去，回去。他很快就回省委。讲话被楼下人群的喊声打断：不要你讲！不要你讲！我们要李葆华下来，一起回去。李葆华又叫身边的另一个胖一点的干部讲。这个干部说：葆华同志马上就回省委去。下面的人群坚持要他一起走，这时李葆华就进去了。接着有人从窗子爬到讲台上，搬起椅子砸学生，学生赶紧躲开。接着里面又传出“打人了！打人了！”的呼喊声，冲上去的工人在三楼高喊：“同志们，冲啊！”，“八·二七把李葆华书记架走了，冲啊！”就这样，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前拥后挤地将李葆华架走了，由一辆轿车将李葆华送往军区。

这就是稻香楼抢人事件的大概情况。“三天流血”事件以后，我问李文安，稻香楼抢李葆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文安说：“十五日上午省委来人同我交涉，要放李葆华回去，我当时就答应了。是外地串联队不让李葆华走，但也答应十五日晚饭前，一定让李葆华回省委。而且我还将李葆华交给了省委派来的干部，并且告诉他们李葆华好好的，以后出了问题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说完，我就按你前一天的通知，带着工学院的同学走了。下午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在现场。”

由于在架走李葆华的过程中，工人与赶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生了扭打冲突，住在省委小礼堂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支持下，晚上召开小型的声讨会。于是抢李葆华的战火直接烧到了省委。“红总”的部分同学高呼：“打倒‘八·二七’！”，“抗议‘八·二七’！”口号冲进会场，还有少量工人也冲了进去，并在省委贴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必须在三日内滚出省委”的大标语。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不在现场。十六日上午，我到省委小礼堂来看看同学们，我看到的情景是，有十几位同学负了伤。“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副总指挥吴祚云也负了点轻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主要头头张来信脖子上挂着一条纱布吊着手，头上还缠满了纱布。我问张怎么样？张回答说：“我这次才看清李葆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改成‘八·二七’”。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有些学校对“八·二七”有保留。同时，我还想劝说他们撤出省委。这样我们主动，何必自己禁锢自己？”张说：“三日期满后，我们一定撤出”。我说：“就是十七日晚上”。“对”！我知道他们是要争气，坚持到十七日晚，就是这个“坚持”迎来更多的流血。

十六日下午，我没到省委小礼堂的现场，政委胡玉才去了。他回来告诉我现场的一些情况，他说：“老保们疯了，要我们的同学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离开省委，否则，他们要采取革命的行动，晚上工人还要来。”我问他，“我们的同学在哪里？还有多少人？今天能不能撤出来？能撤尽量撤，免受损失”。胡说：“吃过晚饭我再去看看，估计撤出来难。”我说：“你最好不要去了，我听‘动态组’的纵封良说，工人指名要打你，你今晚去了太危险。你留下，我去。”胡坚持不同意。晚饭后骑着自行车到省委去了。大约晚上九点钟，有位造反工人找到我，告诉我：

“你们的政委胡玉才被人指认出来，在省委北门外被几个头戴柳条帽的省建二处工人打伤，看样子伤势不轻，被几个‘八·二七’学生扶走了。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立即要前往，那位不知姓名的工人说：“我陪你去，保护你”。我们骑自行车到了省委。那里的人多的要命，水泄不通。大门无法进，那位工人把我领到大门西边二十米处，他帮我翻过铁栏杆爬进去。进了院子也无法进入省委小礼堂，人山人海，推拥不动。我只好再回到围栏边。这时院子里是辱骂声，混合着同学们高喊的“毛主席万岁”声。但有一点我看得清楚，头戴柳条帽的工人，不停地将同学向外拖，被拖的同学还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从当时的情况看，工人是有组织，有准备来的。他们象打红了眼，见到学生模样就挥拳踢脚向外拖。我幸好站在墙边的树底下，他们看不清。我就赶快又从铁栏杆上翻回来，站在长江路上的大批市民也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打人！”等口号，甚至能听到喊口号的人群中有哭泣声。找到自行车回到“司令部”。我立即打电话找陈庆泉，告诉他我要见张恺帆。陈告诉我：“张恺帆在交通厅小礼堂接见蚌埠商学院的学生代表，会还没有结束，他们都在，你赶快去。”放下电话，我正准备走，副总指挥段玉昌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我们俩骑一辆车，（段不会骑车）沿着环城路到了交通厅礼堂。这时是几点，我已无法确定。只见张恺帆和任质斌在台上，商学院同学在台下，正在讨论问题，双方僵持着。我们顾不得许多，大步流星地冲上舞台，劈头就说：“张恺帆！省委要打死人了，你还在这儿开会！”这时任质斌也把头扭过来，并且很吃惊。张恺帆说：“梁守福同志，有话慢慢说，不要着急，省委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说：“我是真不知道。”我把自己在省委大院看到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下。这时张恺帆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太不像话，简直是土匪。”我紧接着要求他把这儿会停一下，我们一同到省委去制止打人事件去。张恺帆说：“我去讲话，他们会听吗？像你说的那么乱，工人又不认识我”。我说：“你不去也行，你写几句话，签上你的名，我找人去广播”。张同意我的意见。他随手写了几句话，对其中一句：“殴打革命学生是错误行为”。我说这样写太轻，没有用。把这句改成“殴打革命学生是反革命行为”。张说：“这样写太重，你们怎么说都行，我不能这样说。”“那就把这句改成反动行为吧。”张想了一下，同意这样写，并加了个“紧急呼吁”的题目。全文是：“‘八·二七’造反队是革命的组织，谁殴打革命的学生，谁就是反动行为。凡围攻革命的学生者，应立即退出省委，否则追查责任，严惩凶手，望照此办理。”张恺帆签上名后，我问任质斌签不签？任质斌说：“有恺帆同志签名就够了，我就不签了”。我紧接着说：“你不签也行，被打伤的同学必须由你护送到北京治疗。不要在合肥治疗期间，再出现新的流血事件。我这是为伤员考虑，也是为你们省委考虑”。张恺帆马上表态：“这样做也好”。任质斌也没有理由反对，最后表态同意。

这时好像天已快亮了，但又进入了另一个流血的早晨。也就是我和段玉昌向张恺帆反映省委大院内情况的时候，全国来串联的同学正在流着更多的血。由于凌晨一点以后，我不在现场，我只能大段摘录一个农民目击者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叫汪宗林，是肥西丰乐公社蒋岗大队第十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十一月十六日，我从公社到合肥来买毛主席语录。下午五点左右，我到省委内看大字报。傍晚，从外冲进来一群工人，头戴安全帽，有的腰里还扎着大皮带。他们气势汹汹，高呼“‘八·二七’滚出省委！……”到了夜间一点多种，又来了一批男女工人。他们是安纺一厂和针织厂的。这时，“八·二七”的学生坐在大楼台阶上读毛主席语录，很多群众自发地保护着他们。工人往里冲，群众往外推。二、三十分钟左右，工人才坐下来。刚退走的省建二处工人又回来了，围着女工站了一圈。我站在台阶下面靠东走，周围几个建筑工人的身上一股酒味。约二十分钟后，东面有一群人冲向学生，把学生从传达室往街上拖，有的揪住学生头发，有的卡学生脖子，拳打脚踢；在我正面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喊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就被一个建筑工人揪住辫子拖走，这位小姑娘喊叫着：“工人叔叔，我不是‘八·二七’，请放下我吧！”这个工人不仅不放下她，而且还把她往地上惯。同时，又有一位男同学被打的爬不起来，一个女工冲上去，朝他的胸口踢了一脚。这时，又有许多同学被拳打脚踢地拖了出去。

大约打了四十分钟左右，工人才罢手。事件发生时，学生并未还手。他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并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学生革命无罪，你们为什么这样打？我们被你们打了，并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是受蒙蔽了！希望你们很快清醒过来。假如你们的子女参加革命被打成这样，你们的心又何忍？”这时，有两位女同学挣扎回来，头发被揪得不像样子，脸被打破了。见此情景，一些老工人流下了眼泪，松开手，自动回去了。很多群众都流下了眼泪，有的哭了起来……。

以后工人陆续都走了，学生们跟在后面送他们，一路高呼：“向工农兵学习！向工农兵致敬！”一直把他们送到东门小花园。这时，天已渐明。

十七日上午，我约《解放军报》记者刘慎思反映情况。我问刘，这两天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没有？刘说：“从十五日下午到十六日夜，我都在现场。这是记者的职责。”他顺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穿的是军装，要穿便衣说不定也要挨打”。

这时，我明白他知道得比我多，而且具体情况，我没有必要再向他多说什么。只是拜托他将情况尽快向中央反映。请他利用记者的便利多关注受伤同学的情况。刘说：“医院我去过了，伤员大概有五十多人”。因为省委还有许多同学和外地串联队的学生。刘说：“我还要去省委”。我在送他走时，他又叮嘱了一句：“作为朋友，我劝你注意安全，省委的同学最好撤出来”。

两天来，同学们不断地流血。我自己也不知道白天黑夜，不知道是过度疲劳，也不知道是亢奋，不想睡觉，也不想吃饭。我再三考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省委院内的噩耗又传来了。我问动态组的同学，院内同学还有退路没有？他们说：“省委北大门和西门都被工人封住了。向外撤，损失会更大，守在楼里，依靠好心人的保护，还可以顶到天黑”。“我能不能进去？”“你白天不能去，他们要是认出你，非打死你不可。”“同学们现在怎么样？”“外面有自发的群众挡住，同学们在里面，暂时还安全。”

十七日六点以前的情况，我不在现场。还是摘录那位目击者农民的话来描述。

十七日上午九点左右，我第二次挤进省委大楼。一个工人告诉“八·二七”的同学，下午四点到六点还要出动比昨晚多两倍的工人前来闹事，但想不到提前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发生了。

工人分成两队，一对从正面攻，一对从后门冲。我慌慌张张地跟同学们一起跑到后门，用东西把门抵住。工人很快就到了。开始砸门，同学们抵不住，玻璃被打烂了。工人站门框上，用棍子对着同学们的头上就捣，站在下面的就用拳头打，门框终于被他们整个推倒了。工人乘势冲进来抓了很多的同学，抓住头发，拳打脚踢往外拖。有的同学被打倒，有的同学眼镜被打掉，受伤的很多。没办法，我们只好退到楼梯口，手挽着手不让他们进。我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们的喊声比我们的更高，盖住了我们的声音。楼梯口只有四十多人，但被他们抓去大半。眼看着楼梯口也堵不住了，我们便跑到走廊上，向堵门边的同学求援。有几十个同学和我们一道回到楼梯口，才堵住了工人，但一个同学仍然被他们拖了出去。当情况再度危险时，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赶来了，给同学们解了围。

第二次是下午三点左右，省建二处工人又来了，比第一次更凶。他们从窗户里进来，进攻二楼，抓去很多学生，拳打脚踢。这时靠两边楼下，有人欧打学生，有一位学生准备拿相机照相时，突然飞来一块大石头将窗户打碎，石头从我的头边擦过。被抓走的同学在外面高呼：“毛主席万岁！”有人不知用什么办法爬到三楼，看到一位同学的左太阳穴被打掉一块肉，血流不止，我将身上的背心撕破给他止血；另一个女同学被工人用棍子捣破了眼球；还有一位小同学被他们从三楼顺楼梯拖下来。惨哪！他们打红了眼，见人就打，连解放军记者的相机他们都要砸。

上面摘录的是一位与“八·二七”素无关系的农民的叙述，以补充我十七日六点钟之前不在现场之不足。

十七日下午五点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工人又来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气喘嘘嘘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今晚九点钟以后，不仅会来更多的工人，而且可能有农民进入省委。他们准备来一到二万人，一定要把省委的大学生全部清走。你们动员同学们退出来。不然，太吃亏了。”这时，我好像才想起要知道他的身份，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谁不要紧，我是好心来帮你们的，以后你会知道我是谁”。这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赶紧写一张命令式的条子，大致的意思是：

吴祚云、张来信并边爱娜：

据可靠消息，今晚还会有更多人前往省委殴打你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省委垮台已成定局，希望你们见字后，在九点钟前撤出省委，勿误！

梁守福 即日

我将条子递给那位工人，并叮嘱一句：“千万送到。万一送不到，也要把条子毁掉”。“你放心，送不到我把它吃掉，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出生入死不报姓名的工人，就是合肥铁路机务段的孟庆元。他是以后合肥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主要头头之一。

条子拿走了，我还是不放心。六点钟左右，去了省委。当走到省委西边省妇联门前时，从长江路自东向西来了一队工人。天黑看不清，估计有好几百人。当时心里一抽，今晚同学们又要遭殃了。队伍到了省委北门一分为二，一部分从北门冲进去；一部分跑步从妇联西边的路上直奔省委西门。我也跑步从北门进了省委。他们一进省委大院就高喊：“同学们不要怕！我们是革命造反工人，‘工联会’的。我们是接你们出去的。他们很快从省委大门到办公楼大门冲出一条道来。工联会的工人站在通道两边和前来冲击的保守组织工人扭打，不让他们靠近学生。说实在的，‘工联会’的工人是抱着拼命的思想来的。保守组织的工人打学生行，见到工联会的工人，就不敢往前冲了，有的开始退却。紧接着从西门冲进省委的一队工人也赶到了省委北门，几百名同学架着伤员比较顺利地撤离省委。

他们一面外撤，一面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万岁！”就在他们高呼口号的时候，许多同学们脸上还流着血。女同学中有的头发被扯散，披头散发，的确惨不忍睹。

我目送撤出的同学沿长江路向西挺进。站在街两旁的群众高呼：“向八·二七学习！向八·二七致敬！”有的地方又响起了鞭炮声。我来的也巧，就在省委接待站的门前，又见到了刘慎思。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他说：“我的职责要我在这里，能不在这里吗？”我说：“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时刘很气愤地说：“李葆华为自己创造垮台的条件！”这本不该是一位记者说的话，可是他忍不住地说了。

三天来，同学们在流血，中共安徽省委的负责人这三天都在哪里？做些什么呢？

李葆华十一月十五日从稻香楼被接走后，先住进省军区，还被省军区司令员严光接到家里做客。后觉不妥，违背中央军委命令，又转入肥东。在肥东录制了讲话，直到流血结束了，才放他的录音。录音的全文如下：

同学们：工人同志们：我是李葆华，我现在代表省委跟大家讲几句话。刚接到中央陶铸同志指示，工人与学生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冲突。希望双方都要按照陶铸的指示办事，立即停止冲突。双方都要退出省委大楼。我们的意见是最好院子里的先退，然后楼里再退，都退回本单位，以后再由省委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解决这次纠纷。

张恺帆十七日写的“紧急呼吁”，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才由“八·二七”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大门东旁，这是我十七日晚看到的。

王光宇十六日晚十点左右，在省委文革接待站的楼上用喇叭讲话说：“工人同志和学生不要发生冲突，请你们回去，明天还要上班，有什么事，省委负责处理。”

副省长张祚荫十七日下午三时许，在楼上说：“同志们，回去吧！不要打，天大的事有省委负责”。

“三天流血”事件共有300余人受伤，重伤51人，胡玉才被打折3根肋骨。后由负轻伤的副总指挥吴祚云带领伤员到北京治疗，省委也派了公安厅一位姓孙的副厅长和几位处长一路护送。到北京后，由周恩来亲自过问。伤员安排在“协和医院”治疗，随后任质斌代表省委也前去慰问。十一月二十日下午，谢富治、刘宁一听了“三天流血事件”的汇报后，也认为“省委是错上加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

“三天流血事件”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会的权力自觉不自觉地发挥到极致的过程。物极必反，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政治之手。“三天流血事件”后，中共安徽省委的权力体系在民众的抗争下，迅速地断裂了！

“三天流血事件”后，合肥，乃至全省出现的重大变化就是血与火的交融。

□ 摘自梁守福：《乱流浮沉半生缘》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